

考古中国

陕西发现十六国至隋唐时期 规模最大独立墓园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了多个遗址发掘、研究情况,其中包括陕西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北城村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墓地布局清晰、规划有序,延续时间长,生动再现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

发掘墓葬285座 出土罕见土雕仿木建筑造型

北城村墓地所处区域位于洪渎原中心区(北周时称石安原),南距汉哀帝义陵8.2公里,东南距汉长安城21公里。所在区域北朝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有集中分布,如西南1.8公里的唐昭容上官氏墓,东南约4.5公里的北周静陵等。

北城村墓地自2021年开始进行考古发掘,至今已发掘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

围沟平面呈曲尺形,除位于现有市政道路之下,东北侧早年已被破坏外,东南、北及西侧保存完好。围沟开口于二层下,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开口部最宽2.4米,底宽1.1米。

围沟内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墓道均有二或三级台阶。已发掘的22座墓葬除一座为单室外余均为前后室,六座墓的墓室还有侧室。10座墓为单人或二人仰身直肢葬,1座有3人,1座为4人。出土有陶人物俑、陶骑马俑、陶牛车、陶九盘连枝灯、陶灶等器物。在M452墓室内发现有土雕仿木建筑造型,为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其中,15座墓的墓室有不规则的侧室用以放置尸骨,12座墓葬墓室内有明显南北横向生土棺床,1座有纵向棺床,3座为不规则形棺床。墓室内尸骨摆放均较为



M3墓葬。

凌乱,推测应是迁葬而来。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出土陶罐、陶模型榻等。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围沟内西侧,呈4列116座墓有序排列,在东北部围沟内侧边缘及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也分布有30座。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发现人骨的墓葬中,单人葬



出土的纪年砖及铜钱。

有36座,葬2人的39座,3人及3人以上17座,合葬墓均表现出迁葬的特点。45座墓室内有生土棺床,其中横向26座,单侧9座,双侧及不规则的10座。出土随葬品较少,以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体现所葬人群的文化发展趋势

目前,北城村墓地同时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

类学、古病理学、碳氮同位素、锶同位素、古DNA学、人骨埋藏环境、测年等相关科技分析,以期获取更多的数据。这对于进一步判断墓地的性质,解读墓地内涵等能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综合现有考古发现与学术认识,北城村墓地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兆沟内墓葬规划布局有序的大型部族墓地,其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特别是东北部东西向呈四排分布的38座十六国墓葬,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该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园,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墓地的墓葬在朝向、间距、深度甚至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表明了该墓地埋葬人群结构单纯,是研究当时社会基层组织运行模式的全新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该墓地各时段墓葬均为东向,与同区域已发掘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墓葬南向的特征判然有别,且从十六国初年到唐贞观年间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保持沿用,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与稳定性。而墓地内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逐渐产生变化,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在丧葬习俗上既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趋势,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进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文物陕西

德国女考古学家安可:背着女儿去考古

德国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安可与四川有着不解之缘。她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期的导师是四川人孙华教授。当年,安可到北大时,跟孙华教授提出,想研究西北考古。孙华教授回答她:“研究西北考古的学者太多了,要不看看西南考古的材料?”这句话,让安可将目光投向了四川,从大凉山的史前考古,到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再到九寨沟的新石器时代高山聚落,安可通过不断发掘和研究,将中国西南地区的丰富文化遗产展现给了世界。

爱上中国考古 “普通人都知道中国有5000年历史”

安可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并非考古,而是汉学。

高中毕业之后,没有找到人生方向的安可干脆学起了外语。那个时候,她对于中国还没有任何研究,只是小时候了解了一点日本合气道以及日本文化,发现了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关联,于是想着“要不干脆学中文吧”。

当她拿到第一本中文课本时,对于中国的了解仅仅是知道中国在哪儿。选择了中文专业后,她从事了三个方向的学习:现代汉语、历史学和经济学。

2001年,大学二年级的安可第一次来中国,在北外学汉语。在北京,她发现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人跟她提到,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连出租车司机、看门大爷和保安大叔,这些并非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

结束了一年在北外的学习之后,安可回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并换了专业,专攻古代汉语。从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安可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在历史书上有名有姓的人,大多数都是王侯显贵,不具备普遍性。“我就想知道,中国古代普通人是怎样生活、怎么做事的。这就是考古学。”于是,安可又增加了考古学和艺术学的课程,尤其是在选择自己的博士专业时选择了考古。

走进四川考古 在孙华教授建议下研究西南考古

2007年,已经开始博士生涯的安可到北京大学进修,认识了孙华教授。一开始,安可想做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孙华教授提出意见,让她看看西南地区考古的资料。“孙华老师本来就是四川人,他觉得那边的资料还不错,就让我看看。所以我到四川之后,参与了金沙遗址的发掘,认识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些人。他们对我特别好,教了我很多。”

除了了解金沙遗址的内容,安可还去了大凉山参与考古发掘。时任凉山州博物馆馆长、考古领队的刘弘给予了安可很大支持。“当然,那边的饮食也很好,考古的资料也好,这不是很完美吗?于是,我就去了。”在大凉山,安可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她还完成了世界上

第一本有关凉山史前墓葬的研究著作。在参与各个考古项目中,安可感受到了中国考古学的变化和发展。“以前我刚来中国时,发现考古工作者根本不够用。我记得第一次去大凉山时,队里就只有一个考古学家,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博物馆或者是从事其他工作的,不是考古专业的。但后来我再去时,发现已经聘用了6个考古系毕业的工作人员,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背着女儿去考古 “农村妇女都是背着孩子干活儿”

实际上,安可第一次来成都,是在2002年,“就是纯玩,和朋友一起旅游,那时根本没有看什么博物馆,就是感觉环境特别漂亮。然后去松潘爬山,觉得非常美。”

2007年再次到成都时,安可已经学了考古学,也学会了品尝四川美食:“四川的美食当然是吃了,因为我比较喜欢麻的菜,感觉很好吃。不过觉得火锅有点油。”

2016年,35岁的安可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从事的还是她热爱的亚洲考古。不仅如此,2019年,当安可来到



安可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李雨心摄

九寨沟进行考古发掘时,把她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也背到了九寨沟。

“不只是我,还有一个川大的老师也把孩子背过去了。”在调查阶段,只要不是特别危险的地方,她都会抱着女儿去。开始发掘了,她把女儿放在工棚里,一边画图一边看孩子。“其实孩子小的时候问题不大,反正她也不能到处跑。在农村进行考古发掘,大家都习惯了。农村妇女都这样,都是背着孩子干活儿。”

安可表示,接下来她还会到四川,继续进行九寨沟的考古项目:“目前正在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九寨沟的项目之前我们只做了一年,还要再做一次。上一次已经做到了汉代,之后还要继续做,可能就是汉代之前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李雨心 马晓玉